

臺灣農會檔案價值與運用

The Value and Application of Taiwan Farmers' Association Documents

□ 范雅鈞 Fan, Ya-Jiun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E-mail: fanyajiun@gmail.com

摘要

臺灣三級制農會體系奠基於日治時期，目前共有302家，發展迄今將近百年，隨著時代背景環境的經營條件不同，曾經風光富裕，也曾陷入財政困境。觀其發展歷史，農會組織制度或經營業務，往往隨著執政者由上而下的政策需求與制度變革，透過法律規定、行政命令或經費補助，軟硬兼施地要求各地農會配合辦理。從各地農會幸運保存的珍貴檔案之中可資證明，百年來的農會系統，經歷幾度體制改革與法令修訂，甚至政權轉換，其官製與官治的基本性格並未改變。

Abstract

The three-tier system of Taiwan Farmers' Associations is based on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about one century ago. Today, the total number of Taiwan Farmers' Associations is 302. With the change of different operating conditions in historical background environments, the Taiwan Farmers' Association has been wealth, but also faced financial troubles. Observed the history development of Taiwan Farmers' Associations, we can find that the organizational system and operation system of the Farmers' Association are always affected by the demands from the top-down policies of government rulers through laws, executive orders, or subsidies. All of the carrot-and-stick approaches want to force Farmers' Associations to coordinate. From the valuable documents of local Farmers' Association show that even have gone through a ruling regime change, the institutional reform and legal amendments, the congenital characters for official manufacturing and official ruling in Taiwan Farmers' Associations still remained without change.

關鍵字：臺灣農會、農會檔案

Keywords: Taiwan Farmers' Association, Farmers' Association Documents



壹、前言

臺灣三級制農會體系奠基於日治時期，目前共有302家，發展迄今將近百年，隨著時代背景環境的經營條件不同，曾經風光富裕，也曾陷入財政困境。觀其發展歷史，農會組織制度或經營業務，往往隨著執政者由上而下的政策需求與制度變革，透過法律規定、行政命令或經費補助，軟硬兼施地要求各地農會配合辦理。簡而言之，臺灣農會具有農政末端組織地位，其先天性格即缺乏獨立性和自發性。

解嚴之後，高壓的政府管制政策鬆動，開放民營銀行申請設立，十餘年來金融業務競爭激烈，不僅造成財政支柱的農會信用部門獲利下滑，加上相關法令過時缺漏，造成不肖者趁中漁利，拖垮基層農村金融，破壞農會公眾形象，造成廢除農會的輿論浮現，政府也著手整頓農業金融，頒布〈農業金融法〉，先後成立農業金融局、全國農業金庫。然而，值此挑戰變動時期，亦有部分農會轉向開展自身經濟事業，例如南投縣信義鄉農會，單打獨鬥自尋生路，成功帶動地方農業與農村發展，成為全國農會仿效標竿。

面對臺灣農會的百年歷史，一鄉鎮一農會的龐大體系，農政末端組織的角色，多目標功能的特殊性，投入研究者除了農學界專家之外，也有歷史、政治、社會、經濟等不同學科的研究對話。中央大學歷史系教授李力庸，專長臺灣農業發展史，其博士論文〈日治時期臺中地區的農會與米作（西元1902-1945）〉研究指出，臺灣總督府透過東鄉實的規劃，西元（以下同）1908年起將臺灣農會整編成為地方政府指導，農會領導核心完全由地方政府官員擔任，所有的農林畜牧業者都是當然會員，「加上警察的配置及保甲的運用，令人有官廳組織的錯覺」。李教授同時指出，當時各地農會制度具有不同風格，每個地方政府都相當懂得善用農會力量以推廣米種改良、農業倉庫、米糧統制等國策（註1）。以上研究觀點與鑽研臺灣農業史多年的農業專家胡忠一博士見解相同。對於日治時期農會，胡博士強調其基本性格為官製及官治機構，具有強烈的準行政機關色彩（註2）。

至於戰後農會研究，部分政治學者、社會學者以「恩庇侍從理論」分析，他們強調遷臺後的國民政府由於欠缺統治正當性，因此利用農會（信用部）此一「區域性壟斷經濟」的資源授與地方派系勢力對其統治權的支持（註3）。不過，以上見解被其他學者提出質疑，他們以歷史發展及個案為前提，認為地方派系早在日治時期便掌握信用合作社、農會、地區運輸業等「區域聯合獨佔經濟」資源，國民黨作為後繼統治者，雖然掌握國家機器，不見得有能力全面主導這些既有資源分配（註4）。另有傾向肯定農會功能的學者認為，農會發展其獨特的社會資本，成為政府農村政策的政策代理者與政策傳送網絡，與政府間形成一獨特而有效的「治理機制」，成功地推動臺灣農村發展與現代化（註5）。

相對於社會學科環繞著「恩庇侍從理論」的解釋架構，以臺灣歷史學界為舞臺，不同學科的學者衍生探討「戰後精英的連續與斷裂」議題，分別有研究論述從議會政治精英、經濟精英、法律人才、日治保正與戰後村里長、農會領導階層等方面進行。不同於1945年政權轉移造成地方村里長大幅更替，1947

年二二八事件之後造成議會精英的斷裂與噤聲，在農會領導階層方面，林寶安教授認為，1953年政府全面推動實施的「農會改進是對農村地主勢力的一次淨化運動」，研究結果顯示改進後的農會領導階層，改由地方派系與國民黨所培植的新勢力所掌握。他甚至將農會改進視為一場具有社會政治改造、鬥爭意義的歷史事件（註6）。黃仁姿、薛化元教授的研究基本上支持上述說法，薛教授進一步指出，戰後臺灣整體的地方精英或社會精英，在不同範疇呈現不一致的斷裂與連續，這某種程度上呈現了國民政府在不同範疇強化其控制力的時間點差異（註7）。

上述研究均仰賴農會史料的蒐集、整理與耙梳，然而查閱上述研究徵引史料多半來自「統治機關檔案」，例如臺灣總督府檔案、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臺灣省政府檔案、臺灣省議會檔案以及國民黨檔案（以黨領政時期）；或者「主管機關官方出版品」，例如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復會）、臺灣省政府農林廳（以下簡稱農林廳）的工作報告、研究報告或統計資料出版品。為什麼沒看見一手史料運用呢？這些研究主體的農會檔案在哪裡呢？1998年以臺灣省農會為歷史碩士研究題目的顏崑智曾經坦言：「因臺灣農會最高層級的省農會並無檔案之儲存及建立，故而缺一手資料，原期望能以口述方法自建資料，後因此工作範圍既大，所牽涉之人員亦雜，故而作罷，史料欠缺實為本文之最大缺失。」（註8）。

事實上，因為屬於民間團體，各公立圖書館或官方機構均未收藏農會檔案，不僅是臺灣省農會檔案史料欠缺，其餘各級農會檔案史料同樣欠缺。於是後進有志研究農會者不得不有「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之嘆，特別是重視一手史料的歷史研究者。推敲史料欠缺原因，首先是民間組織的檔案文書原本就少有保存規則或強制法令，往往隨著職務調動、人員異動就換地方堆置或散佚銷毀。其次，農會是自成體系的人民團體，即使個別農會存有歷史檔案，非農會有關人士不得其門而入。第三，目前全國各地共有302家農會，若有零星檔案保存，個別研究者要用多少時間、經費才能找齊研究所需史料？

肩負臺灣農漁會智庫功能的中華民國農民團體訓練協會（以下簡稱農訓協會），鑑於臺灣農會發展逾百年竟無1本專著，2010年起規劃出版臺灣農會史系列叢書，特地邀請5位農業專家學者共同撰寫首部《臺灣農會史》，筆者忝居總編輯一職。在詳實嚴謹的文字之外，農訓協會希望能搭配豐富精彩的老照片，增加專業書籍的普及性、親切感。為了找尋老照片與珍貴文物，於是筆者親自拜訪其中幾家被推薦的特色農會實地鑑選。

萬萬沒想到，原本以為早已散佚的農會檔案，竟然或多或少地幸運保留了下來。其中，嘉義縣新港鄉農會甚至保留了早自1916年在新港奉天宮廟埕召開的籌備會議紀錄，經歷1945年政權轉移，戰後農會組織幾度改易，迄今97年之間，歷屆次會員大會、理監事會議幾乎完整保留，戰後數十年間的供銷、推廣、人事資料保存也相當完整。

這些來自不同農會的珍貴史料檔案，或因年代久遠有所破損，或因受潮腐朽難辨，因此農訓協會與檔案管理局（以下簡稱檔案局）自2011年起共同合作，規劃以3年時間徵集、修復、典藏這些臺灣農會檔案。訪查後鑑定具有保存價值的農會檔案，獲得該農會同意，隨即捐贈給檔案局進行後續處理，讓珍貴史料獲得最佳處理保存與加值應用。



貳、臺灣農會體系發展與時代特性

農會是臺灣組織系統最完整、數量最龐大的農民團體，目前全國共有302家。一般民衆或者不瞭解農會已有百年悠久歷史，或者一知半解地將「日治時期的農會」當成「今日臺灣全體農會」的前身。事實上，臺灣農業史專家胡忠一研究強調，今日的臺灣農會乃由日治時期的農會與產業組合兩大農業團體，以及畜產會、重要產物同業組合及其他農業相關團體，經過政策性統合成為一元化的三級制「農業會」，再經過戰後接收農會、合作社數度分合及改組之後，方演變為今日社團法人農會體系。

一、農會

日本自明治維新開始，為推動殖產興業政策，仿照英國皇室成立農會組織，於1881年創立「大日本農會」，會長由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出任，主要事業內容為：「農業技術之改良、推廣及歐美農業技術之調查、研究」，會員以皇族、貴族及地主等權貴階級為主，本質即為政府扶植成立的農業技術改良團體。1899年首次公布〈農會法〉，農會以圖謀農業之改良發展為目的，農商務大臣得補助具備其所規定條件之農會。

第4任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與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上任後，著手整頓殖民地財政困境。其要者，實施土地調查規劃增稅，創辦專賣事業，積極推動糖業與稻米增產。1900年9月，臺北縣大嵙崁辨務署為完成臺灣總督府交辦的「土地調查、徵收地租及發展農業」等重要指示，仿效其本國農會制度，召集當地地主及仕紳，組成名為「三角湧農會」的農民團體。外來殖民者一旦獲得當地地主及仕紳的支持配合，新政策與新業務推動則相對容易。此後數年之間，臺灣各地方政府紛紛循此模式扶植設立當地農會，但是並沒有法源依據。

直到1908年12月，臺灣總督府先後發布〈臺灣農會規則〉、〈臺灣農會規則施行規則〉，其主要內容包括：（一）會員的強制加入、（二）會費的強制徵收、（三）以行政組織廳的區域範圍為農會事業區域、（四）農會的會長由地方行政首長兼任。至於農會營運費用主要依賴會費收入及政府補助。法令一經發布，各地已成立的廳農會紛紛依法改組設立。1937年中日戰事爆發，臺灣總督府公布〈臺灣農會令〉、〈臺灣畜產會令〉，另將畜產業務從農會業務獨立劃分出來，另外組織畜產會體系，同時進行臺灣農會制度的全面性改革。隔年正式成立「臺灣農會」，此舉將農會系統由原本地方州廳水平一級制，改成臺灣農會、地方州廳農會的上、下二級制農會系統。

二、產業組合

合作社誕生乃是隨著資本主義社會商品經濟的日漸發達，勞工、農民與中小企業者為對抗資本主義所衍生的矛盾，基於保障自己的權益，改良社會，建立新制度，所共同組成的經濟性合作組織。明治維新之初，部分有識者仿效歐洲合作組織精神，在日本推行名為「組合」或「產業組合」的組織，勸誘各地農民成立，經過一番努力，〈產業組合法〉在1900年終獲立法。

昭和經濟恐慌蔓延之後，為了謀求有效解決對策，日本中央從1933年開始推動「擴充產業組合5年計畫」，全面推廣「信用、販賣、購買、利用」等4種事業兼營的產業組合，極力促使全體農家加入產業組合為社員，擴大各種事業經營，提昇三級制產業組合的組織效率。因此，產業組合組織迅速擴大、事業迅速成長，農家對產業組合的依賴程度也因而大幅增長。

至於殖民地臺灣，推動全島性發展農村合作組織始於1913年〈臺灣產業組合規則〉制定，臺灣總督府採取與日本本國相同的「一市街庄一產業組合」原則，打出「共存同榮」的運動口號。在此之前，民間各種類似產業組合設立的趨勢與數量正逐年提高。因此，調查臺灣三級農會的創立時期，除了少數幾家，其餘多半集中在1914年至1920年之間。「〈臺灣產業組合規則〉發布」5年後，全島共設立了126個組合，約占當時全臺市街庄與區總數的44.21%。10年後，數量激增到290個組合，幾乎完全達成「一市街庄一產業組合」目標。此後產業組合設立持續遞增，直到1940年共501單位，成為臺灣產業組合史之巔峰。

為加強監督整頓產業組合，臺灣總督府於1923年主導成立「臺灣產業組合協會」，會址即設於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商工課之內，會長由總務長官兼任，副會長2名，分別由殖產局長、財務局長兼任，以發行合作刊物、舉辦合作講習、召開全島產業組合大會及表彰大會為主要任務。隨著日本帝國海外戰事擴大，臺灣經濟統制需求也擴大，因此1942年成立「臺灣產業組合聯合會」，將產業組合系統從水平一級建構成上、下二級系統。該會會長仍由總務長官兼任，經費來源包括股金、事業收入及總督府補助等。

事實上，從〈臺灣產業組合規則〉內容以觀，臺灣總督府與其地方官僚不僅直接管理產業組合的社務，例如理監事許可制、盈餘比例、業務執行內容等，同時干預聯合組織設置與運作，不願讓各地方產業組合有機會自組聯合勢力，避免坐大。這些內容相較於合作社起源地歐洲，或是日本本國的產業組合，他們都是社員以民主方式自治的合作組織。由此反觀臺灣產業組合，其本質仍然只是殖民政府遂行經濟統制的各種組織之一，實質是缺乏合作精神的合作組織^(註9)。

三、農業會

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臺灣總督府進一步將州廳農會作為糧食增產的重要統制機構，各地產業組合則淪為州廳農會的下級組織，負責吸收農村資金，消化國債戰時捐、配給統制糧食，配給統制生產資材。

1943年日本本國實施〈農業團體法〉，將產業組合、農會、畜產會、養蠶組合、茶葉組合等5大農業團體強制合併為新的團體「農業會」。農業會不可自由入會、出會，凡地區內經營農業者及地主均需強制加入農業會，會長由地方行政首長任命，政府及地方主管機關可直接對市町村農業會的會員下達相關事務統制命令。同年底，臺灣總督府隨即公布〈臺灣農業會令〉，將島內一地區之內的各種農業團體，諸如農會、產業組合、畜產會、山林會、青果同業組合、米穀組合、鳳梨同業組合、農機製造公司販賣部、糧食協會等全部業務，統一合併為當地區一元化組織「農業會」。從此年起，日治時期臺灣農民團體進入一元化統合階段，同時正式奠定今日臺灣三級制農會組織架構雛形。

各地農業會改組成立之後，為遂行戰時經濟政策、統制農業經濟，主要業務工作包括重要農產品的強制收購，收購糧食貨款並強制貯蓄，肥料及其他生產資材的配給等等。換言之，農業會成立任務即在於確保戰時糧食供給以及配合國策施政，業務經營內容無關於廣大農民會員生產及生計上需求。至此，農業會不僅失去指導農業技術改良目標，更完全喪失合作組織精神，澈底淪為臺灣總督府的戰時農村統制機構。

四、農會與合作社的分合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國民政府成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一方面整理接收日治時期遺產，一方面在臺灣植接國民政府法令制度。就日治末期農業會體系而言，民政處是農業會的法定主管機關，農林處則是農業生產、推廣、品種改良、技術指導的主管機關。接收之初順應輿情，保留農業會組織，僅將日人遣返後的領導階層空缺改用民主選舉，選出大多都是當地精英或仕紳。1946年2月底完成鄉鎮農業會的組織改選，4月中旬完成縣市農業會的組織改選，4月21日召開臺灣省農業會會員代表大會，會中選舉監事以成立臺灣省農業會。會議召開期間接獲中央指示，將農業會一律改名農會，臺灣省農業會即改名臺灣省農會，各地農業會隨後也更名。

農會組織改選完成之後，另有部分人士認為，農會與合作社在中華民國各有法律依據，而且農會是政治性的農民組織職業團體，合作社是經濟性的合作企業，兩者本質不同，兩者若合併，農會易為非農民所操控，不再是農民保障自己權益的組織。因此，他們提出「農會政治，合作社經濟」的原則，主張兩者分立。這種尊重新政權法律的主張，獲得新執政者支持，於是同年4月24日奉中央指示，根據中華民國現有農會法與合作社法的規定，將臺灣農業會系統重新劃分為農會與合作社兩大系統（註10）。

此令一出，引發臺灣社會輿論譁然，紛表反對，因為合作社與農會兩團體在各鄉鎮原屬同一農業會，絕大多數仍在同一屋舍內辦公，人員互兼、業務重疊、財產劃分不清，而且獨立後農會無固定財源，將有實際經營困難。當局不得已只好採行折衷辦法，公布〈農會與合作社聯體經營辦法〉，將兩者名義上劃分但實際上聯體經營。所謂的折衷辦法卻讓農會、合作社之間更為混亂，業務執行幾乎陷於停頓。為此，臺灣省政府乃於1949年7月邀請農復會派遣專家來臺。農復會派遣自立啓發組章之汶組長及郭敏學技正來臺，兩人調查後提出《臺灣省農民組織調查報告》，建議將農會與合作社再度予以合併，使之成為多目標經營體制，並改由農林處主管（註11）。農復會建議被時任臺灣省主席陳誠接受並付諸實施，規定凡原農業會改組之各級農會及合作社，一律併入農會，合併工作在1949年12月底完成。

五、現行農會體系

農會與合作社合併改組之後，農會内部的組成分子異常複雜，會員既有公務員、地主，也有商人、工人、農民，形成官民不分、農工商雜處的混合組織，業無法推動，財務日益惡化，當時全省340家農會之中，虧損者高達190家。為尋求解決之道，政府同意由農復會邀請美國康乃爾大學安德生博士（Dr. W. A. Anderson）來臺調查。安德生博士於1950年9月間抵臺，以5個月時間在臺灣各地考察，期間曾轉赴日本考察3週，為了解美國聯合占領軍在日本輔導設立農業合作社的實施情形與效用，離臺前完成《臺

灣之農會》（圖1）研究報告。

安德生博士認為，臺灣農會的危機在於農會中容納非農民會員的問題。各級農會組織是否能真正代表農民？如何使農民隨時警惕注意農會是農民自己的組織？如何使專為農民存在的農會，避免為外界所利用？安德生博士提出16項建議，其中最重要2點：（一）清理會員資格。（二）建立權責劃分的組織運作制度。政府參酌其建議，衡量現實社會狀態，組織「臺灣農會改進委員會」擬定具體實施辦法，於1952年間頒行〈改進臺灣省各級農會暫行辦法〉、〈改進臺灣省各級農會暫行辦法實施細則〉等法規，隔年10月開始進行會員資格審查，1954年2月完成臺灣省各級農會改組。這次農會改進，就是林寶安教授所謂「對農村地主勢力的一次淨化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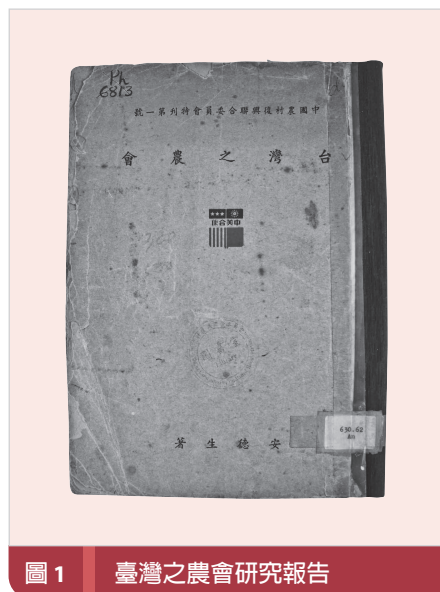


圖1 臺灣之農會研究報告

資料來源：安德生，臺灣之農會（臺北：農復會，1951），原件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典藏。

經過此次的改進與改組，將農會的性質確認為職業團體，具有經濟、政治、社會、教育功能。同時淨化會員資格，嚴格執行農會法規的會員資格限制，貫徹以農民領導農民組織的政策。確立農會組織以農民為中心，使其成為農村中承上啓下的機構，協助政府農業政策的推行。輔導農民在農會中行使4權，培養其領導能力，提高其社會地位，使農村地方自治得以順利實施，希冀達到以政治民主保障經濟民主的目的。在農會內部建立權能劃分的總幹事制度，使理事會有權，總幹事有能。明訂農會業務的經營範圍，使農村中經濟業務的經營保持一元化，同時解決農會與合作社困擾多年的青果運銷問題。加強三級農會上下統屬關係，賦予上級農會對下級農會行使指導與監督之權。

因戒嚴體制之故，國民政府於1930年時期訂定的〈農會法〉，不曾在臺灣施行過。隨著臺灣經濟環境轉變，1970年政府頒布農村現階段建設綱領，隔年行政院長蔣經國宣布加速農村建設方案，積極推行臺灣農業建設，1972年制定農業發展條例做為法律依據。由於〈改進臺灣省各級農會暫行辦法〉只是一項行政命令，根據〈中央法規標準法〉規定，行政命令與法律牴觸者無效，至此，不合時宜的〈農會法〉修正勢在必行。〈農會法〉修正案經1974年5月31日完成立法院三讀，1974年6月12日總統公布實施。

本次修正最大改變在於：將臺灣農會原有股金一律改充事業資金，使其不再具備合作組織特徵，而轉為是一具公益社團法人職業團體屬性之農民組織，但是不改其農政末端機構功能，在農會法定任務之中，有七成以上是政府交辦或委辦業務（註12）。即使在2002年臺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簡稱WTO）之後，農會接受政府交辦或委辦的常態性業務，仍有公糧收購、家畜保險、農民健康保險、全民健康保險、老年農民福利津貼、農民子女就學獎助學金、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農業推廣教育等等。



參、農會檔案介紹與珍貴史料舉隅

如同本文前言提及，民間組織的檔案文書少有管理規則與建檔保存傳統，但由於農會具有特殊的農政末端組織地位，不論日治或戰後，日常與政府單位往來公文資料、信用類傳票或契約以及攸關年資計算的人事資料，一般而言都會保存。差別在於，這些檔案在個別農會的保存數量、建檔編目、收藏空間，大相逕庭。

多數農會因為舊辦公大樓改建或搬遷新辦公室，那些「太久用不到」的資料，幾乎全部清除丟棄。少部分農會因為曾經有認真負責的業務承辦，部分特定歷史檔案得以幸運保存。少數幾家重視檔案管理的農會，例如新北市三峽區農會、花蓮縣鳳榮地區農會，自編「文書檔案分類表」，分類編號原則均參照公務機關檔案文書分類法，檔案室內斥資裝設密集式書櫃，一目瞭然井然有序。

大體沿襲日治末期農業會組織架構，今日農會組織變動不大，主要分為3部門：一、管理部門：會務、會計、資訊。二、事業部門：供銷、信用（僅基層農會）、農產品加工廠。三、服務部門：推廣、保險、輔導（僅上級農會）。以上不同股室編制，又因農會員工人數、規模大小略有調整。在筆者兩年來訪查全國近50家農會之中，除了不對外公開的信用類、人事類、財產類檔案之外，則以會務類最齊全，包括日治時期設立書類、歷年會員大會紀錄、歷年理監事會議紀錄、歷屆選舉與移交文書等；政府委辦業務，包括田賦徵實、公糧收購、軍公教實物補給、肥料換穀等等；供銷類的洋菇栽種與推廣、綠蘆筍與白蘆筍的栽種與推廣；推廣類的四健會、家政指導、農業技術指導、農業機械化推廣等。

在筆者訪查過的農會之中，保有珍貴檔案且同意將珍貴檔案捐贈給檔案局的農會，2011年共有8家，分別有彰化縣農會、嘉義縣農會、高雄市内門區農會、彰化縣北斗鎮農會、新北市板橋區農會、花蓮縣鳳榮地區農會、苗栗縣後龍鎮農會、南投縣竹山鎮農會，其中前5家目前已完成編目建檔，可在國家檔案資訊網上查詢，其餘陸續建置中，總計595案。2012年已確定捐贈有3家農會、3家漁會，農會有苗栗縣後龍鎮農會（接續辦理）、臺東縣鹿野地區農會、嘉義縣新港鄉農會；漁會有宜蘭縣頭城區漁會、金門區漁會、澎湖區漁會。2013年仍將持續接洽有意願捐贈的農漁會。

這些捐贈的農會檔案種類如同農會法定業務一般龐雜，既無法統計分類，更難以在此文內逐一解題說明，以下挑選嘉義縣新港鄉農會、苗栗縣後龍鎮農會之珍貴檔案部分原件，說明其內容與重要性。

一、嘉義縣新港鄉農會檔案

新港早期是平埔族的活動場域，舊名笨港，明末海盜顏思齊率部眾登陸此地，引進漳泉移民入墾，至清康熙年間已發展為繁榮市鎮及兩岸往返重要港口。北港溪幾次氾濫、改道加上漳泉移民械鬥，聚落先分為笨北港、笨南港，其中笨南港漳州人又遷至東南方的麻園寮，改稱「新南港」，繼承了昔日笨港的歷史文化，此為今日新港發展與地名起源，清末更名「新港」。1920年臺灣行政區域調整與地名改正，日本統治者認為臺灣全島有多處「新港」的地名，加上當時新港已遠離河港位置，於是將「新港」改正為「新巷」，設「新巷庄」。戰後接收再改回「新港」迄今。

《總會及總代會議議錄綴（自大正五年至昭和十八年）》（圖2、圖3），整理摘譯日文原文：大正5年第1年度會員大會在新港奉天宮內召開，開會時間從下午3點開始，出席的會員人數57名，全部會員人數有84名，已達法定人數2/3。第1案選出理事、監事、信用評定委員。第2案是貸款金額與貸款及儲金利率的最高額度，第3案限制借款最高額度，第4案貸款遲繳罰金，第5案貸款保證人條件，第6案遲繳出資金的處分，第7案制定組合經費1年400日圓。滿場一致通過上述決議，會議在下午5點結束。

新港鄉農會會務檔案最珍貴之處在於連續的完整性，未因1945年的政權轉換而斷裂，戰後初期經歷農會與合作的分合、農會改進，完整保存迄今。請見《總會總代會議事錄（自昭和19年至民國36年）》（圖4），1945年的《臺灣農業會令報告綴》（圖5），《新港鄉農會與合作社合併會議紀錄》（圖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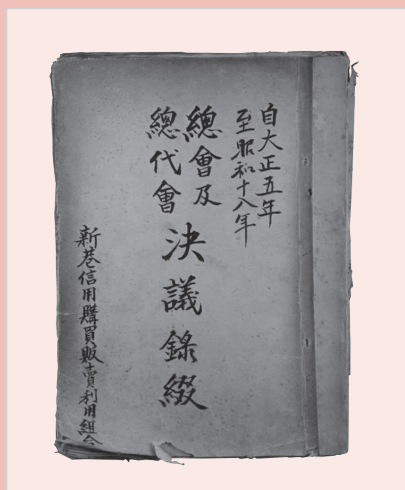


圖 2 1916新巷組合決議錄1

資料來源：來源機關：嘉義縣新港鄉農會。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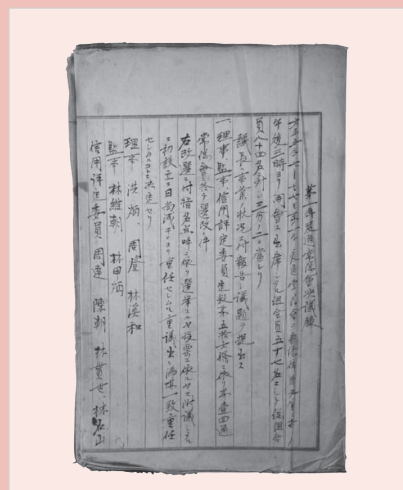


圖 3 1916新巷組合決議錄2

資料來源：來源機關：嘉義縣新港鄉農會。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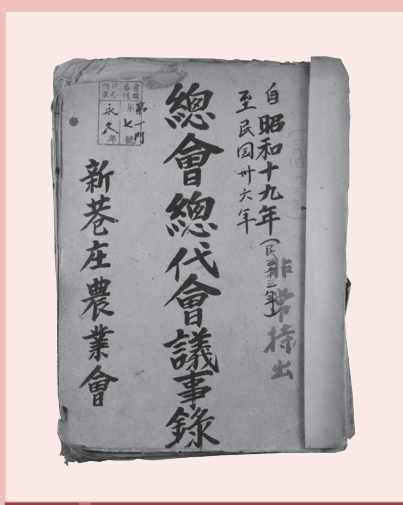


圖 4 1944新巷庄農業會

資料來源：來源機關：嘉義縣新港鄉農會。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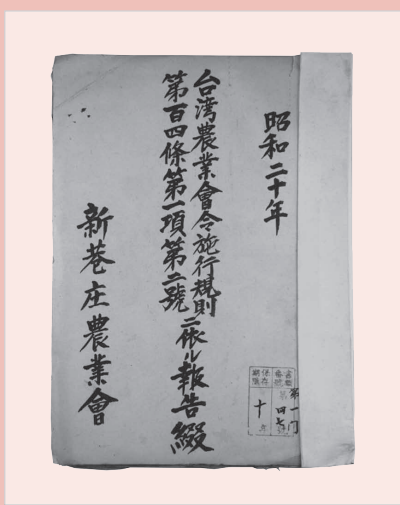


圖 5 1945新巷庄農業會

資料來源：來源機關：嘉義縣新港鄉農會。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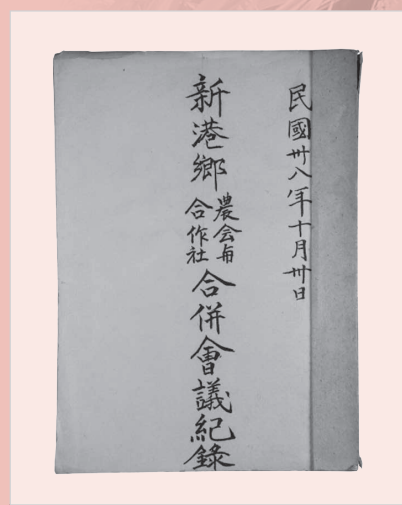


圖 6 新港鄉農會合作社

資料來源：來源機關：嘉義縣新港鄉農會。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二、苗栗縣後龍鎮農會檔案

設立於大正7年5月30日（1918）的「後龍信用組合」，今日苗栗縣後龍鎮農會之前身，其檔案的連續完整性雖然不如新港鄉農會，但是正好保留近百年臺灣農會發展過程之代表性珍貴文件。例如1926年信用組合整頓事件的〈理監事互相承認書〉（圖7）（註13）；〈員工身元保證書〉（圖8）、〈員工誓約書〉（圖9）；詳述其組合沿革的《組合概況書》（下頁圖10），內容包括（一）組合區域的面積與地勢、（二）組合所在位置、（三）設立前的地方狀況與設立動機、（四）組合沿革。以及戰後經歷農會改進後的《新舊任理事會移交清冊》（下頁圖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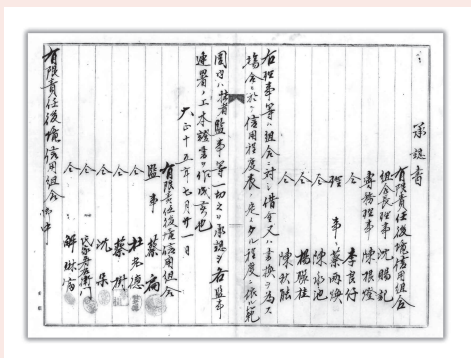


圖 7 1926後龍信用組合承認書1

資料來源：來源機關：苗栗縣後龍鎮農會。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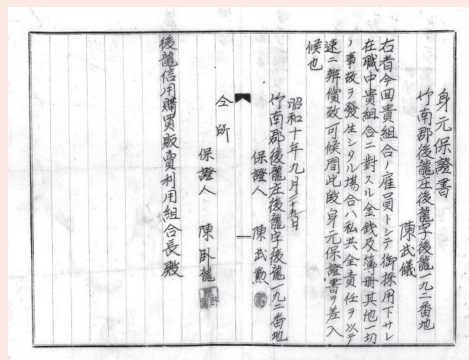


圖 8 1935身元保證書—後龍農會

資料來源：來源機關：苗栗縣後龍鎮農會。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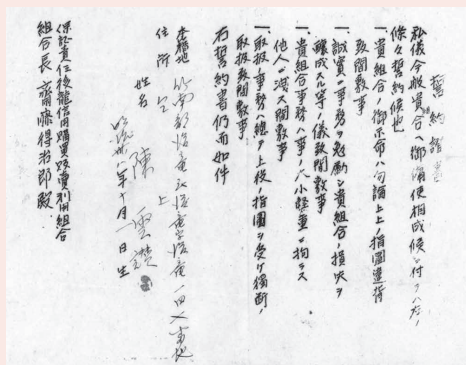


圖 9 1935員工誓約書—後龍鎮農會

資料來源：來源機關：苗栗縣後龍鎮農會。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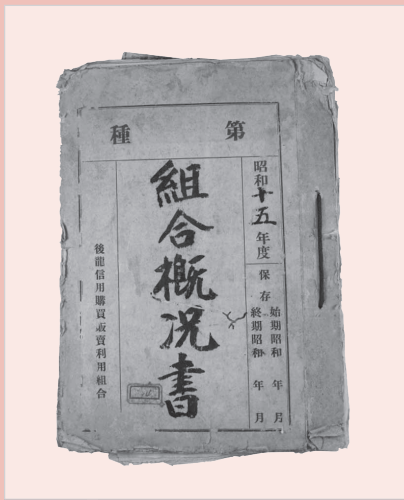


圖 10 1940後龍組合概況書1

資料來源：來源機關：苗栗縣後龍鎮農會。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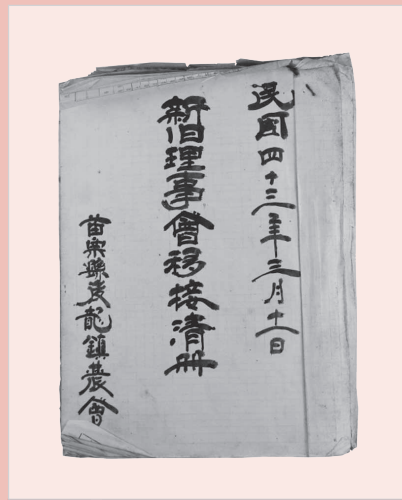


圖 11 1954後龍農會移交清冊

資料來源：來源機關：苗栗縣後龍鎮農會。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肆、結語

本文結語試以筆者兩年來拜訪農會的口述訪談，以及有幸翻閱各地留存的農會檔案，反思現有農會研究的幾項主要看法。

一、農會的農政末端組織地位

根據李力庸教授與胡忠一博士的研究，日治時期農會體系從引進到發展，從一級制到三級制，都是由上而下地扶植成立，與其說是謀求臺灣農業發展，更明確地說應是為了殖民政府統治需要而謀求農業發展。從日治初期需要財政獨立，日治中期需要殖產興業，日治晚期的「農業臺灣、工業日本」需要加強農業統制，這些都可從農會檔案之中無所不在的「奉當局指示」、「當局命令」、「共體時艱」、「響應皇軍」的往來公文得見。

戰後，國民黨政府順勢承接已然整編完成系統化的農會制度，經過幾年的局勢不明、政策搖擺，終於在1949年底農復會的農業專家們遷臺、美國恢復經濟援助之後，陸續改組、改進臺灣農會的領導階層與農業技術。早期糧食局利用農會系統執行肥料換穀政策，藉以達成「安定民食，供應軍糧，爭取外匯」3大目標之外；經濟發展之後，高舉「農業培養工業，工業發展農業」大旗，大量鼓勵種植可外銷的農產品以賺取外匯，從香蕉、鳳梨到洋菇、蘆筍。然而，隨著臺灣經濟起飛、政治解嚴，國際自由貿易蔚為主流，大環境的變因太多使得政府制訂農業政策的考量不如以往單純，農會業務經營也因國內外政經環境的改變而處於變革時期。這些歷史都在農會檔案中留存。

簡而言之，從農會檔案一手史料可證明，百年來的農會系統，經歷幾度體制改革與法令修訂，甚至政權轉換，其官製與官治的基本性格並未改變。

二、用「恩庇侍從理論」解讀農會派系的適用程度

從某些角度或個案而言，社會學科研究者提出的「恩庇侍從理論」似乎可以輕易地解釋臺灣農會與新舊外來統治階層的關係，但是理論的史料基礎是否足以支撐呢？如果從筆者目前翻閱過的個別農會檔案而言，既有個案符合所謂「恩庇侍從理論」，也有部分個案似乎不太符合該理論。

對於這些個案的初步想法，筆者較傾向中國傳統的地方仕紳治理機制。也就是說，不是新統治者用政治特權施恩於地方仕紳換取效忠，而是對於長年以來照顧地方居民，富有善名人望的地方仕紳（通常是大地主及其後代子孫），新統治者尊重並承認他們在地方上的傳統地位，雙方互不干涉，公文往返行禮如儀。這類農會往往不會因為政權轉換而立刻發生領導權更替，卻是因為子孫經營事業不善或是地方新勢力人物崛起而被取代。

三、戰後的連續與斷裂？地理的連續、歷史的斷裂

關於戰後的連續與斷裂議題，就筆者接觸現在農會領導階層與從業員工的經驗，深深感觸著，從事農業的天然地理條件是連續的，但對於過往歷史知識、史料保存卻是斷裂的，只有極少數農會員工瞭解自身農會歷史，有些農會資深員工對於年少時業務執行細節雖然記憶鮮明，但缺乏政策法令或檔案紀錄佐證。例如，蓬萊米的試種與大量栽培始於臺中州農會，但是今日臺中市農會（前身為臺中州農會、戰後臺中縣農會）卻因為辦公廳舍搬遷與整理之故，除了近期檔案，不論日治時期或是戰後的歷史檔案全都沒有留存。戰後長期處於戰地體制由國防部統治的金門縣，其農會因為信用部被接管、臨時性檔案儲存倉庫失火、辦公室搬遷等因素，也幾乎沒有保留檔案，除了偶而在農地間看到幾支反空降樁矗立，戰地農會的業務內容與特色，再也無從瞭解。

註釋

註1：李力庸，《日治時期臺中地區的農會與米作（1902-1945）》（臺北市：稻鄉出版社，2004）。

註2：丁文郁、胡忠一、胡盛光、廖朝賢、顏建賢等，《臺灣農會史》（臺北市：農訓協會，2012）。本文日治時期農會沿革主要參考該書第二章、第三章。

註3：恩庇侍從理論架構的提出與使用，參考吳乃德、陳明通，〈政權移轉和精英流動：臺灣地方精英的歷史形成〉，《臺灣光復初期歷史》（臺北市：中研院社科所，1993）。朱雲漢，〈寡佔經濟與威權政治體制〉，《壟斷與剝削——威權主義的政治經濟分析》（臺北市：臺灣研究基金會，1989）。

註4：林寶安，〈農會改進：戰後初期臺灣農會體制的建構〉，《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1卷1期，（民98年3月）：146。

註5：廖坤榮，〈臺灣農會的社會資本形成與政策績效〉，《政治科學論叢》22期，（民93年12月）：201-213。

註6：同註4：180-183。

註7：黃仁姿、薛化元，〈戰後臺灣精英的連續與斷裂：以農會精英為例〉，《臺灣史研究》18卷3期，（民100年9月）。

註8：顏崑智，〈戰後臺灣農會研究——以臺灣省農會為中心〉（國立中興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1998），緒論之研究方法。

註9：胡忠一，〈日據時期臺灣產業組合與農會之研究〉，《農民組織學刊》2期，（民86年6月）。

註10：胡盛光，《農會法的理論與實務》（臺北市：大偉書局，1992）。

註11：章之汶、郭敏學當年完成考察之後，不久隨同農復會來臺，服務期間盡心輔導臺灣農會，並完成相關著作。章之汶著，郭敏學譯，《農業教學研究推廣之聯繫體制》（臺灣省農林廳印行，1964）。郭敏學，《多目標功能的臺灣農會》（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郭敏學，《合作化農會體制》（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頁請補充頁數。郭敏學，《臺灣農會發展軌跡》（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84）。

註12：同註2，頁35。

註13：同註2，156-157頁，1926信用組合整頓事件。